

四川崖墓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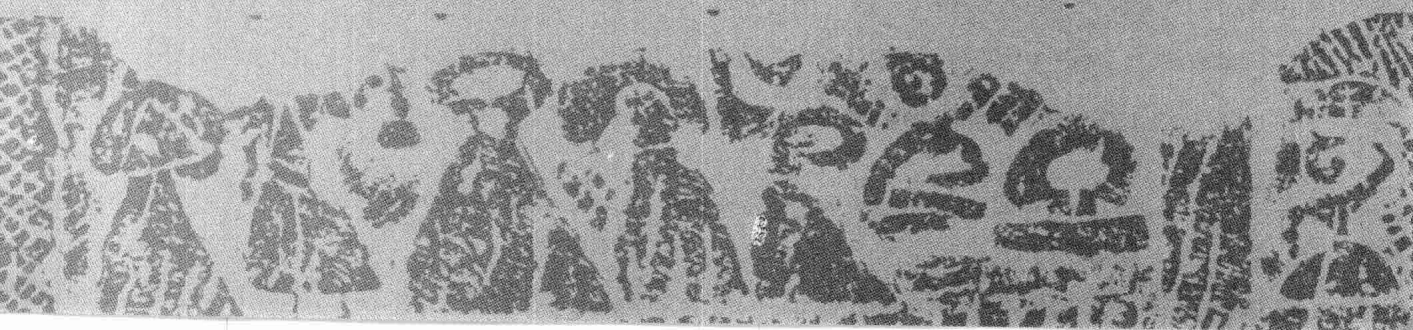
范小平 著

崖墓作为一种葬式，凿穴筑室，藏棺其中，位于山谷间，“阔数丈”，有的“深至数十丈”。或单室，或多室。四川崖墓，凝聚、凝固了古代四川地区民俗、宗教、建筑、雕塑、绘画等门类的艺术精华于崖窟之中，它像无声的史诗，是古代四川相关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场景的缩影。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崖墓艺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川崖墓艺术 / 范小平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3
ISBN 7-80659-827-8

I.四... II.范... III.崖墓—美术考古—研究—四川省
IV.K8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0922号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重点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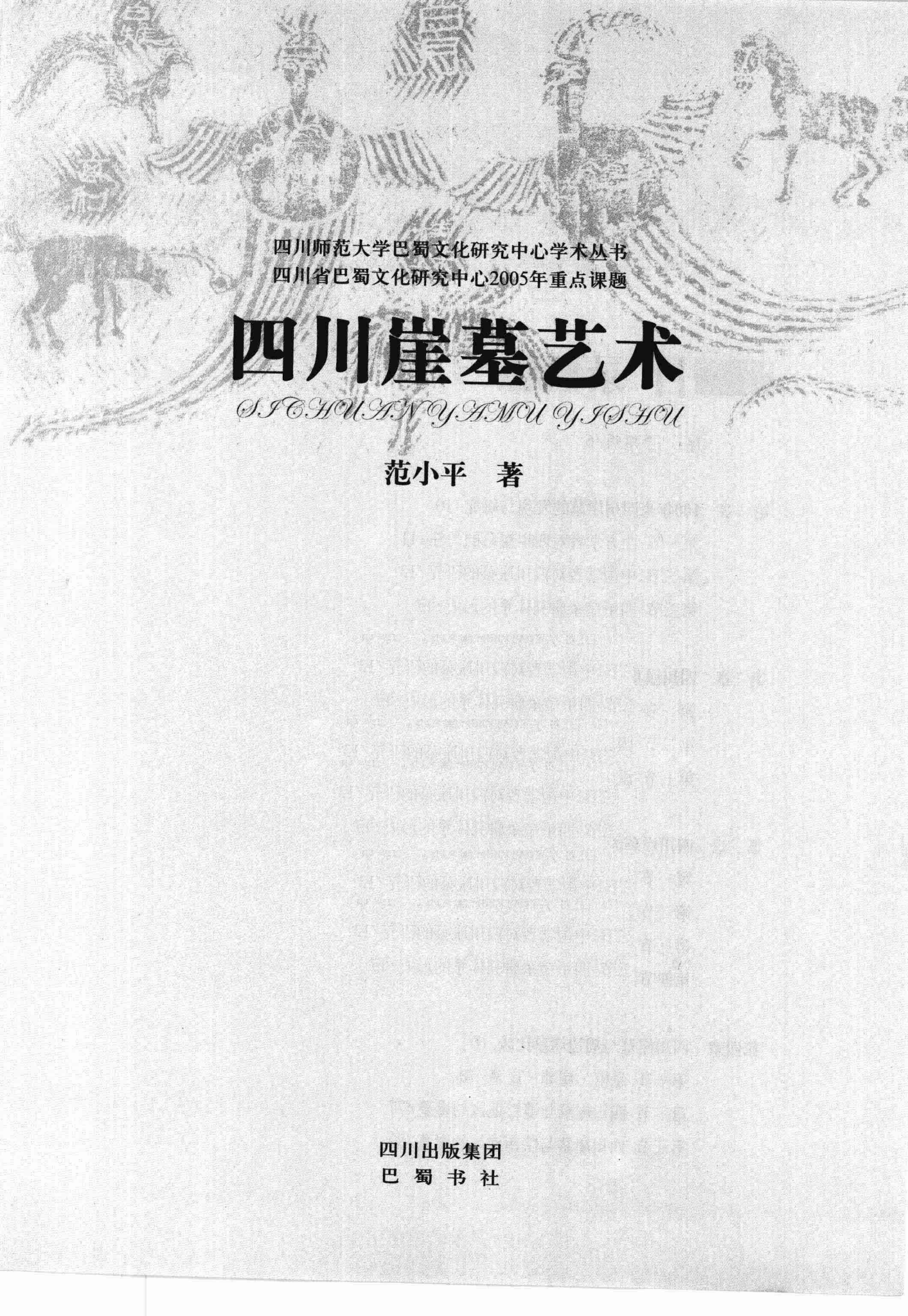
四川崖墓艺术

SICHUAN YAMU YISHU

范小平 著

责任编辑	陈 红
装帧设计	邹小工 黄 雪 柏小坡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巴 蜀 书 社 (成都槐树街2号)
	发行部(028)86259422 (028)86259423
电 话	总编室(028)86259397 编辑部(028)86259436
邮 编	610031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制 版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科刊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12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06年4月 第一版
印 次	2006年4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9-827-8/K·134
定 价	28.00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重点课题

四川崖墓艺术

SICHUAN YAMU YISHU

范小平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目 录

序 李绍明/6

第一章 100年来四川崖墓的发现与研究/10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四川崖墓的关注/11

第二节 中国学者对四川崖墓的研究/13

第三节 四川崖墓研究体系的形成/17

第二章 四川崖墓的时代及其分布状况/23

第一节 文献中的四川崖墓/24

第二节 四川东汉崖墓/26

第三节 汉以后的四川崖墓/32

第三章 四川崖墓的类型结构及地方特色/39

第一节 成都—乐山崖墓的类型与结构/40

第二节 涪江沿郪江流域地区崖墓的类型与结构/47

第三节 川东南崖墓的类型与结构/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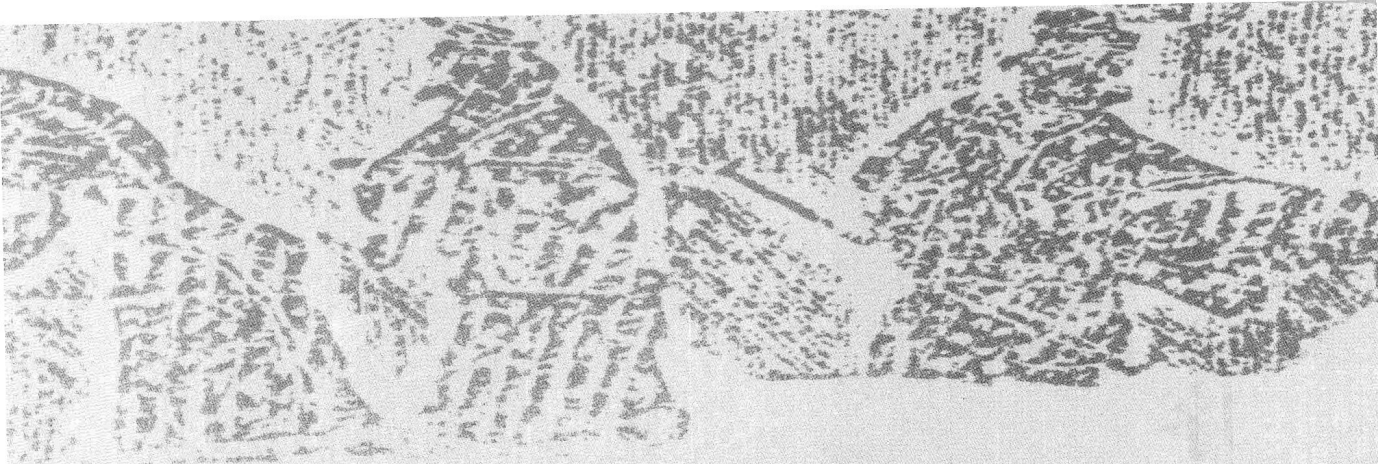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巴渝崖墓的类型与结构/59

第四章 四川崖墓与周边崖墓比较/69

第一节 悬棺·崖葬·崖墓/70

第二节 四川崖墓与滇黔地区的崖墓/77

第三节 四川崖墓与陕南地区的崖墓/82



第五章 四川崖墓的艺术成就/89

第一节 崖墓陪葬俑/90

第二节 崖墓画像石棺(石函)/98

第三节 崖墓摇钱树/108

第四节 崖墓壁画/114

第六章 四川崖墓石刻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123

第一节 四川崖墓石刻的建筑艺术/124

第二节 四川崖墓石刻的人像造型艺术/138

第三节 四川崖墓石刻的动物和图案装饰艺术/152

第七章 四川崖墓石刻所反映的中国民俗艺术/161

第一节 四川崖墓石刻中的性题材研究/162

第二节 四川崖墓与东南亚及西亚崖墓比较/168

第三节 四川崖墓雕像中的佛像艺术/175

后 记/181

主要参考文献及图片出处/183

图 录/184

序

李绍明

崖葬 (Cliff burial), 即崖墓葬。是指在崖窟或崖壁安葬人的遗体的一种葬俗。崖葬大体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将葬具放置在天然崖穴中的称崖洞葬, 将葬具置入山崖层里罅隙的称崖墩葬, 在悬崖上凿孔钉木桩搁置葬具的称悬棺葬, 将葬具放置在开凿的山崖窟龕中的称崖窟葬。崖葬通行于我国古代的众多民族中, 并分布于我国南方广大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吴国的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上即对这种葬俗作了记载。崖墓, 与崖葬关系尤其密切, 都是“以崖为墓”的无土葬式。范小平先生所著《四川崖墓艺术》所言的“崖墓”即“崖墓——凿穴筑室, 藏棺其中”。它是四川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墓葬形式。其特点是直接利用山崖向山腹内开凿墓穴。墓室在墓穴门内, 前堂、门阙等在墓穴门外; 两部分置于同一平面上。墓室内的排水沟、壁龕、灶台、案龕、石棺、石函等均系利用原生岩琢磨而成, 与墓室融为一体。其多室结构崖墓, 则普遍为家族墓葬, 其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是区别于崖葬的最显著特点。

四川崖墓, 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巴蜀文化体系, 它分布广阔, 东起重庆巫山、巫溪; 西至四川汉源、昭觉; 北抵四川广元、陕西商洛; 南达云南昭通、贵州遵义; 东西约750公里, 南北约800公里范围内都有发现。其中四川盆地为崖墓分布最密集地区。它发展历史悠久, 四川盆地各地至今普遍保存着东汉—六朝的崖墓遗存, 距今1900多年。川南地区, 崖墓的发展则可以由东汉追述至明代。它内涵丰富, 从四川崖墓的发展演变史来看, 其间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建筑艺术和民俗风情。

对四川崖墓的研究，始于1877年。英国学者巴伯（E. Colborne Baber）到四川岷江中下游一带作考古调查，在其所著《中国西部旅行研究》（Travel and Research in the Interiorly China）中比较详细介绍了四川犍为一带被当地人称为“蛮子洞”的“崖窟陵（葬）”情况。以后100多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四川崖墓葬的研究就没有中断过。上个世纪4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曾在彭山王家沱大规模地进行崖墓考古发掘。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参加了发掘工作，同时调查了乐山白崖、宜宾黄伞溪等地崖墓。上个世纪80年代，四川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使得学术界对崖墓的研究向前大地推进了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川西地区尤其是涪江沿鄯江流域的崖墓考古工作的几次重大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四川崖墓研究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四川省的乐山麻浩崖墓群、彭山江口崖墓群、三台鄯江崖墓群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的长宁七个洞崖墓群、宜宾黄伞崖墓群、南广河崖墓群、石成山崖墓群、中江柑桔梁子崖墓群、中江天平梁子崖墓群、彭山顺河崖墓群、乐山白岩崖墓群、乐山肖坝崖墓群以及重庆直辖市的江津石坎崖墓群、南川河沙村雷劈石崖墓群、大足邮亭镇双墙村双墙崖墓群、綦江中峰镇鸳鸯村柏树林崖墓群、綦江文龙乡亭和村七拱嘴崖墓群、江津柏林镇水浒村长沟崖墓群等，先后被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市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与此同时，一批新发现的崖墓群也先后被川渝的县、市、区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由于各地基本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陆续上马，又不断传出崖墓考古的重大发现。因此，重新审视100年来对巴蜀崖墓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四川崖墓研究集中于墓室艺术——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之中。造型艺术中最具特色和最具普遍意义的是墓室雕塑艺术。崖墓雕塑艺术，包含其墓室的大面积浮雕、圆雕、半圆雕、深浮雕，直到单体六面体雕塑。包括了平面减底及石雕工艺技术表现形式。浮雕图像主要作为墓壁、棺床和石棺的装饰。值得注意的是崖墓墓室壁画（墓室壁画分为彩绘浮雕和壁画）。这类壁画主要集中分布在川中地区的三台、中江、郪江流域一带。在三台县郪江镇金钟山、柏林坡，在中江县民主乡的塔梁子一带就发现了大面积的墓室彩绘，从现存的残迹观察，郪江流域有相当一部分崖墓都不同程度地施有彩绘，并且是在墓室大面积地涂绘。崖墓俑也属于墓葬冥器雕塑，是崖墓造型艺术组成部分之一。它在中国雕塑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崖墓俑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大多放在石棺、瓦棺、陶棺或棺床部位作为陪葬品。崖墓俑和汉代土坑墓、砖室墓发现的同类俑，其造型及工艺相同。崖墓俑的造型艺术直接丰富了中国汉代美术史的社会内容。崖墓钱树是崖墓考古中最具价值的冥器之一。目前业已公布的保存比较完整的钱树包括：彭山一株（1972年出土于彭山江口镇M176崖墓）、绵阳两株（一株为1982年绵阳子山石塘乡崖墓出土，另一株为1990年绵阳何家山M2崖墓出土）、新津一株（1992年新津宝字山崖墓出土）、三台一株（1985年三台灵兴镇胡家湾崖墓出土）等。这些钱树的出土对于研究崖墓艺术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川崖墓建筑艺术突出表现在崖墓的类型与结构之中。由于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崖墓的类型结构有着明显的区别与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川西类型、川中类型、川南类型和巴渝类型等。崖墓墓室结构，分单室、双室、多室，带双翼侧室、耳室，侧厅套双室、耳室，前堂后穴等结构形式。单室墓为各地普遍存在的状况。墓室的功能性结构，诸如斗拱、门楣、藻井、隔扇、壁龛、棺床、石棺（石函）之类，其建筑艺术成就是比较突出的。崖墓石棺（石函）也是崖墓建筑艺术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建筑艺术之一。

范小平先生通过长期的基层文物工作积累，并深入巴蜀崖墓分布密集地区进行调查，将100年来巴蜀地区崖墓考古研究的各种材料，从考古学、美术学、民族学等学科入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比较，从而科学、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巴蜀崖墓的发展及演变规律问题，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反映四川崖墓艺术发展史的学术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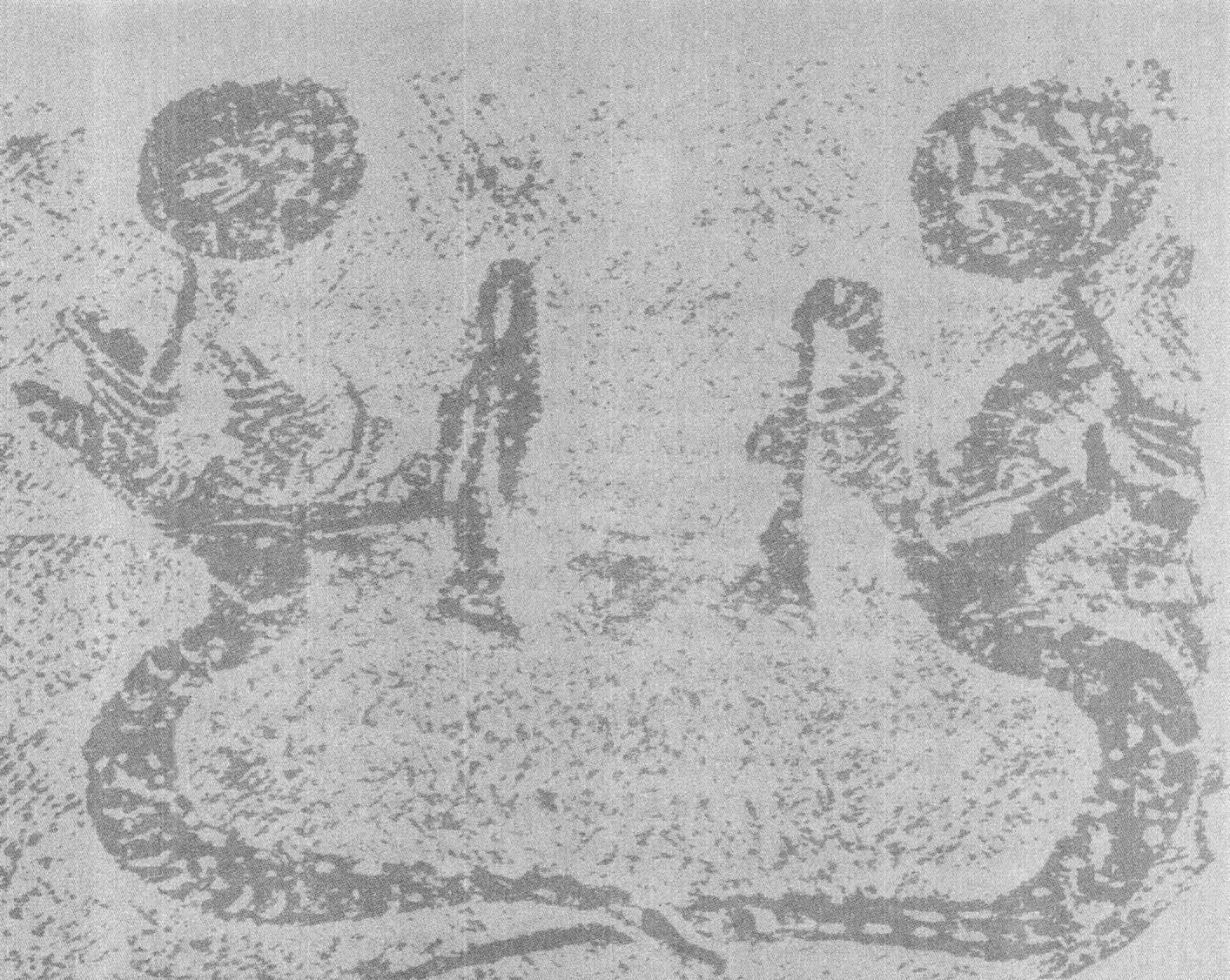
范小平先生的这部学术著作，重点把握了四川崖墓自东汉流行以来，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时期，跨度为1500多年的历史脉络，深入研究了崖墓艺术所包含的画像砖、画像石、画像石棺、墓室壁画等墓室装饰艺术的形式和社会内容，在把握崖墓类型结构、崖墓建筑艺术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在墓壁、地砖、中心柱、门楣、棺床、石棺等墓室功能性建筑艺术中，以及在对人物俑、动物俑、陶建筑、摇钱树等墓室陪葬冥器的深入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墓室壁画、墓室浮雕壁画等新领域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图像学的研究模式，有了理论创新。范小平先生在墓室艺术研究中，结合当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佛像南传系统”，以崖墓考古材料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佛像南传系统在巴蜀崖墓装饰艺术中存在的事实。这些都是该著作的主要特点和突出贡献。

总之，《四川崖墓艺术》，代表了目前国内巴蜀崖墓研究的水平。作者以美术考古为主线，运用了美术学的基本原理，站在中国美术史的高度，在对川渝崖墓艺术进行排队的同时，结合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福建等地和东亚及东南亚、西亚地区的同类型墓葬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拓展了巴蜀文化新的研究领域。在此，谨祝范小平先生的大作问世。同时对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能推出这样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学术著作，表示衷心敬意！

是为序。

2005年6月28日

（李绍明：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名誉会长，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第一章



100年来四川崖墓的发现与研究

西方学者对四川崖墓的关注

中国学者对四川崖墓的研究

四川崖墓研究体系的形成

第一节

西方学者对四川崖墓的关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四川嘉陵江流域、岷江流域、涪江流域沿河台地一带被当地人认为十分平常的、人工开凿近似居所的“蛮子洞”石窟，为来川的欧洲旅行者所关注。这些“蛮子洞”在四川地方志中很少有记载，据船夫、挑夫或地方老者介绍，“蛮子洞”为昔日“蛮夷”之居室或坟墓。

1877年，英国学者巴伯（E.Colborne Baber）到四川来考古调查时，在岷江流域一带发现了众多的崖窟，据当地人士介绍，巴伯在其所著《中国西部旅行研究》（Travel and Research in the Interiorly China）一书中，比较详细介绍了四川犍为一带的“蛮子洞”情况。^[1]

四川沿江流域台地所发现的“蛮子洞”情况引起了日本学者的关注，1906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葬在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对四川多处“蛮子洞”进行了考察，经过与其他类似横穴墓葬比较，认为这是中国汉代墓葬的一种。在其《西南支那》一书中，他认定四川发现的这些石洞为中国汉墓的另一种形式。^[2]

1908年，英国传教士陶然士对岷江流域的崖窟石洞进行了专题调查。通过对叙府、内江、资州、嘉定、彭山、新津、威州等多处洞穴的研究发现，认定为中国汉墓。其题为《四川之墓葬》的调查报告在上海《亚洲文会志》第四十一卷（1910年）发表。1930年，陶然士又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四卷上发表了同类文章。陶然士写道：“川中石洞，简繁不一，大者深三百余尺，小者也百尺，洞中棺槨有石瓦之别，石棺大小也殊，一般长约七八尺，宽约三尺，高约三尺半至四尺不等。”^[3]

法国考古学家维克多·色伽兰（Vieter Segalen）、基尔贝特·法占（Gilbet de Voisins）等于1914年沿四川嘉陵江、岷江流域进行了对此类“蛮子洞”的考古调查。1935年出版了《汉代墓葬艺术》一书，其中详细介绍了保宁府诸窟、绵州诸窟、江口诸窟、嘉定东西诸窟、岷江下游诸窟。1940年冯承钧先生将其翻译为《中国西部考古记》，

将“嘉定西诸窟”的有关文字翻译成：“据前所述，吾人得断言曰：四川之崖墓，为汉时之中国古墓……有人以为此乃石器时代之遗迹，此说非也……至若以诸窟属于蛮人一说，在今以前，或可主张，盖一无铭志，二无记载也。”《中国西部考古记》将色伽兰在长江支流嘉陵江、岷江流域考古旅行时所发现的“方向不定，常依天然崖石之直线开凿窟门”，其中四川汉代遗物甚多的崖窟，称为汉代“崖墓”。书中按崖墓地域分为嘉陵江流域和岷江流域。分为六种类型：一、保宁府诸窟。二、佛州诸窟。三、河口诸窟。四、嘉定东诸窟。五、岷江下游诸窟。六、嘉定西诸窟。^[4]

1930年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西伦在其著作《中国古代艺术史》第二卷《汉墓》的介绍中，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四川嘉陵江、岷江流域的崖墓石刻。书中写道：“一种特殊的汉代墓群由所谓‘蛮子洞’而组成，它们开凿在四川岷江、嘉陵江流域的砂崖上，尽管严格地说，它们与中原这个时期的汉墓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暂时可以作为色伽兰的报告基础而描述。……本国文献中，有关这些奇妙的崖墓的历史资料的不足，很可能是他们造成一些古怪的解释和传说的主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几乎没有任何疑问，它们开始于1世纪和2世纪。它们的雕刻装饰提供了十分明确的时代证据，他们原来的用途由墓内发现的冥器及石棺足以清楚表明。”奥斯瓦尔德·西伦对四川崖墓的性质和时代，通过对彭山、嘉定、犍为崖墓状况的对比，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5]

1937年，英国人贝福特（G·H·Becliord）在上海《中国杂志》（第24卷·1937年）上也对四川汉代崖墓艺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介绍。英国人托瑞斯（T·Torrance）也沿岷江、沱江流域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华西边疆研究会》杂志第四卷上，介绍了在乐山、彭山、新津、内江、资州、叙府一带发现的“刻饰之繁”的崖墓石刻。^[6]

此外，毕晓普在《宾夕伐利亚大学博物馆》杂志第7期（1916年）上发表了《远东旅行记》，文章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介绍了当时四川崖墓的分布状况。

西方学者及西方刊物对四川崖墓研究的浓厚兴趣，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很快，一批从事文物考古、美术史研究的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一批学术成果在20世纪30-40年代应运而生。

第二节

中国学者对四川崖墓的研究

上个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商承祚先生较早进入了四川崖墓研究领域,书写了中国学者研究崖墓石刻艺术的学术篇章。30年代中后期,商承祚先生一行从成都出发,经新津沿岷江流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崖墓考古调查。商承祚先生将乐山一带抗日战争中挖防空洞时发现的诸如麻浩崖墓等墓葬定为东汉墓葬。他认为,此类墓葬为大型多室墓,墓洞较深,有床、棺和各类雕刻。内涵丰富,雕饰精美,其中的中国最早之石刻佛像,极其重要。后又专门写信嘱咐有关当局妥善保存保护。他认为其石刻艺术,对研究佛教文化和东汉时期四川民族风俗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商承祚的研究成果在《金陵学报》第十卷第一、二期上刊出,文章以《四川新津等地汉崖墓砖墓考略》为题,分“崖墓的原始”、“崖墓的时代”、“崖墓的构造”、“墓中的冥器”、“石棺的辩证”等“砖墓的种类”以及“结论”部分对岷江流域一带发现的崖墓群进行了比较深入透彻的研究。^[7]

1936年,嘉定人杨枝高先生在从医之余,潜心于文物考古。他先后考察了成都、广元、南充、蓬溪、简阳、彭山、嘉定等地崖墓,并在《华文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刊载了《四川崖墓略考》研究文章,记录当时四川崖墓分布状况。文中写道:“川中石洞为蛮洞者众口一词,不见著录,新津、彭山、乐山沿江两岸,触目皆是,不可数计,苍溪、阆中、南部次之,简阳、绵阳、梓潼又次之(少雕刻)。近三四年中,成都会府佑客,由新津石洞中搜出不少画像残石出售,海内金石家尤是注目。(予)于今夏乃由成都北至广元,由广元沿嘉陵江达顺庆、蓬溪、简阳回成都,复由成都沿岷江彭山至乐山,所经二十余县,凡遇石洞皆必留意其造作,虽凿治有大小精粗之不同,而其为用则一也,小者不具载。”文章还指出,四川崖墓石刻“所刻图画,古朴有致,较之武梁祠、孝堂山及南阳残石,其作风实有过之而无不及”^[8]。

1937年,当时中央大学的金毓黻先生、常任侠先生在重庆嘉陵江沿江一带作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大量崖墓。在沙坪坝嘉陵江西岸崖墓中,发现了画像石棺两具,上刻有饕餮、伏羲、女娲等图像,该石棺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收藏。^[9]



1941年7月，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组成的“川康古迹考察团”对四川彭山崖墓进行了考古调查。图为吴金鼎（左一）、夏鼐（右二）等参加考古发掘人员的合影。^[10]

1940年1月，金陵大学教授商承祚来乐山，他赞成色伽兰的有关四川崖墓的意义及论述，作了《麻浩崖墓题记》。1942年12月16日，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吴金鼎应武汉大学历史学会的邀请，到乐山讲学。吴金鼎在乐山讲道：“关于崖墓……土人都统名曰‘蛮洞’……。以墓中保存古物多少为标准，则新津第一，彭山第二，嘉定第三；以规模大小为标准，则嘉定第一，彭山第二，新津第三；以雕刻内容为标准，则嘉定第一，新津第二，彭山第三。”

1942年，前中央研究院曾在彭山王家沱大规模地进行崖墓考古发掘。当时的营造学社参加了发掘工作，还调查了乐山白崖、宜宾黄伞溪等地崖墓。营造学社留下了崖墓测绘图和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梁思成遗孀林洙女士就此回忆道：“调查发现，这些崖墓多凿祭堂于前，自堂内开二墓道入，墓室辟于墓道之侧，祭堂内壁面有浮雕枋柱、檐瓦、禽兽等；祭堂外壁亦雕有阙、石兽等。彭山江口附近崖墓则无祭堂，墓道外端为门，门上多刻两重檐叠出，下刻兽及斗拱。在墓门或墓室枋斗或散斗下，皆施血板。”^[11]

1946年，四川大学博物馆郑德坤出版了《四川古代文化史》，该书在第十一章中，把崖墓和砖墓分专题予以介绍，并对于此前国内外学者对四川崖墓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性总结，同时对于彭山江口崖墓、嘉定麻浩崖墓、白崖柿子湾崖墓、新津崖墓、重庆沙坪坝崖墓等作了进一步介绍。郑德坤先生就四川砖室墓和四川崖墓的艺术特色进行了比较。书中写道：“川中崖墓之遗存尚多，分布于嘉陵江、岷江、沱江流域之石崖上。嘉陵江北起广元，经阆中、绵阳、南充、蓬溪，南至重庆；岷江流域上起威州，经新津、彭山、乐山、犍为，下至宜宾；沱江流域之起简阳，经资中、内江，下至泸州，无不有崖墓发现。”四川砖墓与崖墓关系密切，“为同一民族、同一时代之风俗似无可疑，然二者之建筑，一以砖砌为椁，一以凿崖为墓，方法上确不同”^[12]。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内学者对于四川崖墓的研究，已经进入比较深入的阶段。国内学者贺昌群对于在四川邻近地区发现的、其状况有相似之处的崖葬式墓葬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其葬式不是巴蜀文化类型。贺昌群还首次提出了川中地区涪江流域的三台县一带也有崖墓发现，只不过是其雕刻与乐山崖墓比较要少得多。当时的渝版《星期评论》



1942年，营造学社在乐山白崖崖墓进行调查。



1942年乐山白崖崖墓



1942年彭山王家陀崖墓

第三十七期上刊载了贺昌群的《四川的蛮洞与湘西的崖墓》研究文章。文章通过对嘉陵江、岷江、沱江、涪江流域发现的崖墓群的仔细分析，与湖南沅江、川滇边界的崖葬、崖墓群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沅水流域的崖葬，与川滇崖葬是否是同一回事？这二者与岷沱二江流域、嘉陵江及涪江流域的崖墓是否是同一回事？”这一值得学术界研究和思考的命题。^[13]

1947年，当时金陵大学的刘铭恕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中发表《崖墓稽古录》文章，论述了“蛮系崖墓”、“汉系崖墓”。他写道：“葬而临山险，则为崖墓。墓而瓦棺，兼有冥器，则为汉葬。”“四川规模宏大之汉系崖墓，征之古记，仅有宋洪适《隶释》所载汉张公宾张氏族葬之墓。以近世发现者之多，则古代所暴露于世者，尝绝不止此。”文章还介绍了《录异记》卷六所记载的新都县、仁寿县的汉崖墓古代发现时的状况。并提出了这类崖墓是“较大之族葬坟区”，即为家族墓葬。^[14]

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会，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对四川彭山崖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并留下了珍贵的原始发掘记录。1945年，前中央博物院驻四川宜宾李庄筹备处对其资料进行了整理。除全部制成文物卡片外，还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器物 and 陶瓷俑，绘制成墨线图，准备作为文字报告的插图使用。这部报告，历经周转，于1987年由南京博物院整理出版发行。